

对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考察

钟 小 敏

内容提要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四川省委坚决、认真地贯彻中央各项决议,制定了在四川开展苏维埃运动的策略原则,苏维埃运动在四川逐步展开。由于受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理论指导有明显“左”的倾向。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逐渐由攻占中心城市而顺应客观规律转向军阀力量较为薄弱的川东和川西北农村,建立了红色区域。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壮大,并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配合作用。

关键词 八七会议 中共四川临时省委 苏维埃运动 红军游击队 土地革命

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是指1927年10月至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苏区以前,四川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形式,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核心,以土地革命为主要任务的革命运动。它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组成部分。对于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目前似缺乏专门的探讨和论述。本文拟就对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发展作一系统的考察与探讨。

一、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初步兴起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国共合作,党曾在极短的时间内,设想继续与左派国民党合作,认为在政治上,“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旗帜,很有革命威信,中国共产党不应让出这个旗帜。”^[1]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2]但是,由于国民党集团政治上日趋反动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使中共中央认识到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因此,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明确指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3]“现在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的新的最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在农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中实行民选政府”,并阐明了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工农兵士贫民”的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式和道路是通过在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暴动”而成^[4]。这表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完全独立地领导工农开展苏维埃运动。中华苏维埃

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

1927年9月2日，奉命回四川工作的刘披云将中央组织部委托携带的八七会议文件送交四川临时省委。这些文件是用药水写在《封神榜》一类旧小说上的。临时省委接到文件后，立即用药水洗出抄录下来，由刘披云在省委机关内传达。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对四川政治局势的分析，临时省委详细讨论了四川工作方针，提出了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党的组织等行动方针。10月2日，中央致信四川省委，指示省委重新讨论工作计划。中央在信中指出：以后在土地革命阶段中，要坚决执行工农阶级暴动，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现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总目标^[5]。临时省委接受中央的指示，认真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对四川农运作了新的部署。积极以城市斗争来配合农村武装暴动。10月10日，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任务与策略、左派国民党与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在四川开展苏维埃运动的各项策略原则。为了统一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思想，临时省委还克服经费、技术等困难，创办了党内刊物《政治通讯》和《四川通讯》，用以指导和推动四川的革命运动。

1927年10月22日，临时省委发出通告，将省委制定的《关于政治任务与策略、左派国民党与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随同中央文件下发各地，要求各党部接到后立即召集各级会议，举行党内讨论，迅速贯彻，并将结果详报省委^[6]。11月，全省各地迅速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苏维埃运动逐步在四川展开。

1927年11月，在中共川西特委的领导下，成都人民开展了要求四川省教育经费独立运动。1928年1月，又举行了人力车工人为抗议资方提高车租和杀害工人冷光裕、叶少武有数十万工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同月，中共川西特委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劣币斗争。这些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大规模的反对军阀的群众运动。但由于当时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加上临时省委认为四川的农民运动除少数几个县，如江北、彭县、綦江外，几乎全无基础，因此这些斗争虽然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军阀统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运动多以经济斗争为主，仍处于较低水平阶段，还没有发展到组织工农武装暴动，摧毁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度，进而夺取政权的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大会认为“现时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形势”，“在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7]。指出“在发动农民暴动，进行游击战争时，一定要树立创造革命区域的目标”^[8]。由于十一月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滋长的“左”的情绪，提出了中国革命在性质上“必然是急转直下，……进于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9]，因而作出了在全国举行总暴动的策略。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建立了广州苏维埃，中央认为“这是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信号”^[10]，要求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起义和武装暴动，掀起了中华苏维埃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28年2月10日，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11月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制定了指导四川苏维埃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省委分析了当时四川的环境认为：由于军阀对人民群众严重的剥削压迫，各地不断爆发抗捐、罢工运动，社会矛盾尖锐，工农贫民迫切要求革命。在二三月间农村青黄不接的春荒时期，农民尤易趋于革命。因而“组织暴动，领导暴动实成为各地党部刻不容缓的工作”。省委决定加紧组织工农群众，在二三

月间实行春荒暴动。哪怕“在极小的斗争中,也要领导群众去了解暴动之必要”,“由零碎的游击式的战争,汇合成一个大的暴动,迅速形成弥漫全川的春暴局面”^[11]。暴动的目的是推翻封建势力及一切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及共产党组织,迅速形成四川的革命高潮。因而,“这种目的,无论暴动是否胜利,都是可以达到的。故我们应该极坚决地,不计成败去执行这个暴动政策。因为即使失败,亦等于胜利。”^[12]“在暴动的区域里,应坚决没收土地,屠杀豪绅,组织工农兵苏维埃”^[13]。

这个《大纲》还规定,暴动后的政权组织分为临时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两种。临时政权机关为革命委员会,其组织比较简单,可由工会、农协和兵士等团体推举代表若干组成。下设军事、土地、粮食、财政、宣传等科,或暂不分科而集中全力领导暴动。关于苏维埃政权,《四川乡村苏维埃组织法草案》和《市县苏维埃组织法草案》规定,市、县、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兵士、知识分子选举其代表若干组成,酌情设军事、财政、土地、粮食、邮电、外交、警察、反革命裁判等科。为了巩固政权,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政权建设。《大纲》还提出了苏维埃暂行行政纲,分为政治组织、军事组织、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几个部分。

关于政治组织。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独裁政权。其任务是要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机关。剥夺封建地主、官僚及一切剥削者、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

关于军事组织。工农革命军是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组织政治警察,专门搜索、镇压反革命分子,维护革命秩序,保障社会安宁,巩固红色政权。

关于土地政策。苏维埃政府无代价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包括祠堂、学校、教会等的土地,分给穷苦农民。分配标准以每户农民的耕种能力而定。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

关于经济政策。没收帝国主义在川的一切工矿企业、银行、商店、交通机关。收回帝国主义在川的海关、盐税、邮电等管理权。废除旧的财政机关及捐税制度。苏维埃政府统一制定市场价格,严禁奸商任意抬高市场物价。

关于社会政策。发展乡村义务教育和城市平民教育。在工厂、乡村中设立通俗书馆、阅报室、俱乐部等文化机关,宣传革命,普及文化知识。苏维埃政府努力于卫生、防疫、防灾等社会公益事业,提高工农民众的健康水平。尊重人民习俗,保障人民的信仰自由,提倡婚姻自主。

《四川暴动行动大纲》是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它详尽地提出了在四川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的策略原则。其中,《四川乡村苏维埃组织法草案》及《市县苏维埃组织法草案》对各级苏维埃政权内部革命力量的配置,机构的设置作了具体规定。暂行政纲虽不是一部完整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纲领,但它对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及土地分配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和具体规定,勾勒了四川早期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大纲》为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设计了总体蓝图,为苏维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指导和实施细则。它表明四川省委领导苏维埃运动的理论准备更加完备,对以后四川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大纲》在各地传达后,以“打响就是胜利”为号召,武装暴动的局面在四川形成并掀起了高潮。据统计,从1928年3月到1929年2月,四川先后组织农民暴动和兵变共15次。即1928年春的南溪农民暴动,宜宾农民暴动,邻水农民暴动,武隆梓桐山游击队的斗争,潼南兵变,万县兵变,涪陵罗云坝农民暴动;7月的绵竹农民暴动,武隆火炉铺农民暴动等等。

这一时期,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总的显示出两个特点。

第一,这些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武装暴动,和以前的暴动有显著的不同。在四川,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官僚、豪绅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军阀派系林立,各踞一方,鱼肉百姓。四川人民生活极为艰辛。他们不时自发地组织起来,或打富济贫,或抗粮、抗捐、抗税,显示了四川人民不屈的反抗精神。但是,他们的斗争基本上沿袭历史上农民战争“揭竿而起”,“一哄而散”的方式,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没有政权思想,因而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与旧式农民暴动的显著区别在于:它是在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的指导下,由党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为目的,以攻占县城为重点的革命武装暴动。如万县兵变,即以攻占县城,建立“川东苏维埃”为目标;绵竹暴动“以攻占绵竹县城,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为目标;川南暴动也拟以泸州、自贡为中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及红色割据区域。同时,在这些暴动的纲领中都提出了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任务。

第二,暴动过分依靠土匪力量和民团武装,给革命斗争带来了严重的结果。如南溪农民暴动,由于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数量不多,川南特委在制定暴动计划时,着重考虑了联合土匪武装作为暴动的主要力量。但土匪武装没有经过教育改造,封建积习浓厚,思想芜杂,摇摆性很大,在关键时刻起了消极作用。绵竹暴动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过分依靠民团武装,结果不仅暴动未能成功,暴动领导人被假意参加暴动的汉旺团练队长所诱杀。暴动失败后,民团头子伙同反动军阀在绵竹城内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屠杀革命人民,绵竹城乡一片白色恐怖。特委后来在总结失败教训时指出:“南溪党不肯做艰苦的群众组织工作,重视土匪及其运动,企图以土匪及其他力量来完成暴动,是非常错误的。”^[14]暴动的失败,使特委认识到,“相信军队、土匪力量,而不相信自己工农的力量,暴动以土匪军队为主力”,“是不懂得暴动的真实意义”。“暴动必须以工农群众为主力,联合其他力量才能不失为工农革命的暴动”^[15]。

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四川党组织领导四川人民进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规模巨大,轰轰烈烈,给国民党统治的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它把四川农村的广大农民引入了全国性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洪流之中,为以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此后不到半年,苏维埃政权就在四川各地陆续建立起来。

二、组建四川红军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权

党的八七会议坚决地结束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投降错误的同时,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党的十一月会议提出在全国暴动的总方针和一些极左政策,使“左”倾错误第一次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着拼命主义的情绪,因而各地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而盲目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湖北共青团内某些领导人就认为“即使组织一两天苏维埃也是好的——就算没有相当胜利的希望”,企图以武汉三镇仅存的600多党员和不到3000的有组织的工人,夺取唐生智统治的中心武汉。湖北省委有些领导人虽然也看到了“主观力量及组织太过薄弱”,认为还不具备马上暴动的条件^[16],但为着避免机会主义的嫌疑,又想用“提出一百二十分的口号,收到八十分的效果”的“打吗啡针”的办法,来提高同志们的勇气,也认为“即使做到在很短时间宣布苏维埃政权都有很大意义”^[17]。四川临时省委在全国各地准备暴动的形势下,虽感到“党组织不健全……若亟引导暴动以进行土地革命,理论上似觉困难”,“但据目前湘鄂两省,已有相当的暴动预备”,“斟

酌当时环境及形势,决定暴动区域若干个”,“以农民暴动为中心,土地革命为目的”^[18]。号召全省各地举行“不论大小,不择时间,不计胜败的群众武装暴动”^[19]。

其后,由于“左”倾错误指导下举行的一连串暴动遭到了失败,从而使中央在实践中对暴动有了新的认识。第一,认识到暴动“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的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因此,不仅要把暴动和农村中和平的政治或经济的斗争加以区别,同时也要同城市中工人带有武装性的斗争或农村中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加以区别^[20]。第二,强调暴动需要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即(1)有“成千上万的而不只是部分的劳动者参加革命”;(2)有“绝大多数群众”而不只是“工人阶级中少数激进分子”“有坚决斗争的意志”;(3)有坚强的工农组织;(4)有坚强一致的铁的共产党。在上述四个条件具备后,还需要适当的时机,即在“敌人最懦弱”,“斗争最有希望”的时候组织暴动^[21]。第三,批判了当时广泛流行的“建立三天苏维埃政权也是好的”的观念。指出“暴动是革命的最高点,也是革命的最终实现”,如果只是暴动而不能取得胜利,其结果不仅使“革命向后延长”,而且会使斗争的群众遭受比斗争前更加严重的新的痛苦,“那便犯了很大的错误”^[22]。1928年1月12日,中央在发布的通告中又着重批判了“不顾群众力量的倾向的表现:不动不暴和玩弄暴动”,指出这亦是机会主义之另一方式之表露^[23]。

1928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中指出:“由于四川党的力量非常弱,工农运动还没有基础,四川虽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但还不是一个暴动的时期,而是一个创造暴动的时期。你们决定要在成都马上设一特委负责指导成都暴动及川西教匪运动,同时命令下川东各县立刻开始组织暴动,并且决定令成都马上在城内尽量多爆发群众的游击战争,这些很显然都是不正确的。”“成都并不是一个暴动的局面,固然谈不上一个革命高潮。你们仅仅根据一点学潮及反劣币的运动来决定暴动,显然没有认识到什么是暴动的条件。抗税斗争固然可以发展到武装暴动,至于游击战争完全是在乡村中农民斗争的一种方式,并不能适用于城内。希望你们参照中央关于武装暴动之意义通知纠正你们的错误”^[23]。中央还指出:“四川省委在此艰苦的工作时期中,尤须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切记只重军事不要群众的军事投机或是单纯的农民暴动,并且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24]。

从1927年12月底开始,中央连续发出指示,对于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着的盲动主义情绪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央还采取具体措施,纠正各地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杀现象。可是因为“中央整个不断革命的理论 and 不断高涨的估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对于盲动主义虽然有部分的零碎的纠正,而一般盲动主义的倾向和主张此倾向的理论与精神始终不能挽救过来,即中央本身亦是如此。”^[25]在中央看来,对各地盲动主义的纠正,只是为了更周密地准备实现全国总暴动计划。因而,这种纠正也只是“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26]。中共中央指导全国总暴动的“左”倾理论,直到1928年6月党的六大召开,才从根本上得到了纠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党的工作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提出并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议对革命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它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浪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因而“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当前,“党的总任务不是立即举行武装起义,而在于争取群众”^[27]。党的六大否定了“不断革命和不断高涨”的观点,提出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

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了一条基本正确的政治路线。会议还讨论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问题。指出，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彻底的实行土地纲领”，“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的基础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工农革命军——红军”，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将是“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28]把工农革命军的建立，看成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发展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这在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是由于六大回答了这个关于革命能否前进的最基本的问题，使“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29]。

1929年3月，四川临时省委发出通告第七号，停止了《四川暴动行动大纲》中关于开展全川暴动的“左”倾盲动政策。省委明确指出：目前四川主要的政治任务，是组织群众和加强党组织。党目前的策略主要“不是在全川暴动”，而是要“实现地方暴动和地方政权的建立”。“建立工农兵贫民真正的民众政权，为一切工作和一切斗争的总口号。”^[30]同时，怡生特委和治华旅委在给省委的报告和工作计划中，都明确地提出今后要致力于成立红军，深入土地革命，以促进革命高潮到来。

应该指出，四川临时省委以上对形势的分析和制定的策略，是基本符合四川实际情况的。此后，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以组建系列红军游击队，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成立苏维埃政权为主要任务继续深入发展。

（一）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城口、万源、宣汉苏区根据地

1929年4月，经过党多年的宣传、组织工作，共产党员王维舟、李家俊等将活动于达县、宣汉、万源、大竹等地的农民起义军组成“城万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1929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城口、万源、宣汉三县边境5个区20多个场镇，约200平方公里，有人口6万多。省委派文强（李哲生）到部队任党代表，成立了军事指挥部。1930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命名“城万红军”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3月2日，红军率领农民3000余人攻下城口县城，正式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宣布没收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1930年3月3日，《新蜀报》刊载了红军游击队攻下城口县城的情况：“李家俊是次率领农民，俱受过相当军事训练，并有共产中坚分子从中鼓励领导，其战斗力强。加以神兵数百人在前线冲锋，其势尤不可挡。竟于昨日神兵先行爬梯进城，农民继之，将城口刘耀卿团全部缴械，并将县知事击毙，各局卡被烧光。李家俊入城后，发布告示，宣布没收土地，烧毁契券等共产政策，自称红军总指挥。对于各乡之土豪劣绅，则多由各乡农民协会从权处理，其罪重者处以死刑。已被处死的豪绅达十余人。因此，各地农协会会员，日益增多，势力日益扩充，乡政权已被彼等掌握。由此可见起义军声势之大。”^[31]

此后，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在李家俊等同志率领下，因时利势，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战术，粉碎了军阀刘存厚两次对红军的围剿，屡次重创敌人，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官僚。

（二）四川红军第一路军——蓬溪县苏维埃政府

经过党多年的兵运工作，经中共四川省委讨论批准，1929年6月29日，军阀邓锡侯所部江防军第七混成旅旅长共产党员旷继勋、党代表罗世文率部4000多官兵在蓬溪县牛角沟宣布起义，打出了缀有镰刀斧头的“四川红军第一路军”的红旗。起义爆发后，四川省委发布《为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兵士举行兵变的宣言》，向全川工农兵士及广大贫苦民众宣布：第七混成旅全旅官兵，举行革命兵变，其目的是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省委要求各地方组织密切配合红军行动。

6月30日,红军攻入蓬溪县城,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刘汉秋当选为主席。7月1日,红军离开蓬溪,攻向西充,占领了南部县新政坝,在当地成立了县苏维埃政权,何庸任主席。随后,部队转战营山、梁平等地。

(三)红军第二路游击队——以丰都栗子寨、回龙为中心的苏区根据地

1930年4月7日,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在涪陵罗云坝发动起义后,将罗云坝农民赤卫队和起义士兵300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5月19日,根据省委指示,游击队迅速攻占了位于丰都境内的栗子寨、茶园等地。这时,石柱县、丰都县及周围的农民赤卫队纷纷到栗子寨会师,游击队扩大到2000多人。经前委研究决定,在栗子寨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苏区各项工作。

5月下旬,红军游击队在栗子寨召开分田大会。当众烧毁了红契、佃约和借据,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分田委员会带领群众,丈量土地,铲除田埂,插上写有分得土地人姓名的竹标。分到土地的农民满怀激动地说:“我们几辈人没有种过自己的田地,今天分得了田地,要感谢共产党和红军!”根据地从栗子寨迅速扩大到回龙、杜家岩、张家岩、火烧岩等地,以火烧岩为中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根据地集市活跃,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心安定。红军在回龙场还建立了红军医院。部队加紧整训,并发动群众掀起了参军热潮,准备开辟新的区域,迎接新的战斗。

6月11日,贺龙所部400余人,由湖北入川进驻太平坝,正式成立了太平坝苏维埃政权,吴三吉当选为主席。建立了农民武装,何海云为指挥,杨云昌为参谋。苏维埃政府在红军的支持下,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乡苏维埃政府还统一制定了土地证。当土地证发到农民手中时,农民个个扬眉吐气。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热情,青年农民也踊跃参军,苏区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红军游击队还先后在回龙场附近建立了数个乡苏维埃政权,形成了以丰都栗子寨、回龙为中心的红色割据区域。

这一时期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在四川省委、省军委的直接指导下,配合各地方党组织建立了系列红军游击队。这几支红军游击队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锻炼,能够较为正确地审时度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川党对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多数成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形成了数块红色割据区域。在苏区根据地中,发动广大贫苦农民,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这时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在斗争策略上有明显的提高,并具有一定规模。

三、发动第三次游击战争,创造川东苏维埃

正当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1930年7月,中央派余乃文来川任军委书记,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由李立三等人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力量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左”倾冒险主义在四川再一次推行开来,四川又掀起了暴动高潮。

按照中央指示,省军委将全川划为五个军区,分别以梁万、重庆、自贡、成华、顺庆为中心,共组织十七路红军,限三个月内发动,会师重庆,进攻武汉,参加全国总暴动。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为非常时期领导斗争和行动的組織——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暴动。

1930年7月,省军委委员覃文根据省委指示,将农民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8月初,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1000余人奉省行委命令,执行中央关于“下川东的红军必须积极沿长江两岸向鄂方面发展,争取武汉的首先胜利”的指示^[32],东出四川,参加会攻武汉。由于部队仓促行动,准备不足,沿途遭军阀部队的追击和猛攻,红军游击队大部被击溃。只有少数在司令员王维舟的率领下,突出重围,返回梁山、达县边境。

8月23日至9月3日,省委委员罗世文在合川、江津两地接连发动四次兵变,并以农暴相配合,打出了“四川红军第四路游击队”的旗帜。但是,由于组织不当,均迅即失败。10月,国民党第二十八路军第二混成旅驻广汉官兵3000人发动起义,经过数小时战斗,起义军控制了广汉县城。第二天,中共川西行委在广汉县城内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颁布了政纲、布告。同月,还爆发了以建立“四川红军第七路川东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为目的的铜梁县土桥农民暴动和声援自贡工人,为“夺取自贡地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进行大罢工而发生的荣县农民暴动。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承认中央“对于革命形势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上,都有过分地估量”,“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33]立三路线被纠正。四川党也于1930年底撤销了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工会各级组织,暴动逐渐停止。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四川的推行,严重地损害了这一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党员由4000多人下降到1500人。党在白军中的1000余党员损失到不足200人,几乎完全断送了党在白军中的组织力量^[34]。四川革命运动遭到严重挫折,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1931年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四川省委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有所抵制。省委工作重心逐渐由攻占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而顺应客观规律地转向四川军阀力量较为薄弱的川东和川北农村各地。

1932年5月,省委发布《关于创建川东苏维埃实施大纲》,明确指示:下(川)东虎南区域受一、二、三路红军的影响,创建了初期的赤色区域,群众情绪高涨,斗争尖锐。群众要求武装,要求土地,要求政权的愿望十分强烈。梁(山)、万(源)党部当前中心任务是积极领导群众夺取武装,建立游击队和红军,组织农民群众建立川东苏维埃,使苏区与红军巩固地向前发展。省委决定将梁山中心县委改为梁达中心县委,以加强对游击军和地方工作的领导。

在敌人“围剿”“清乡”的险恶条件下,川东游击队由王维舟率领,在宣汉、万源、达县和平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游击队又发展壮大起来,全军已达500余人。在梁山百里槽、宣汉县南坝场、达县蒲家场等建立了数块游击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内,游击队坚决依靠群众,采取正确的对敌斗争政策,依据有利地势,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并以井冈山为榜样,最终形成了以大山坪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为了配合红四方面军入川,在南充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党组织力量强,群众基础好,有着险要地势的川北南部县升(钟)、保(城)地区,举行了著名的升保起义。起义后,将武装部队200余人,群众1000余人合编为川北工农红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起义在升保地区掀起了革命风暴,参加群众达万人,震动了全川北,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约16000人,趁四川军阀混战,川北敌人兵力薄弱,防御空虚,一气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在通江县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

委员会,作为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前的最高政权机构,并着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红四方面军发动“宣、达战役”,川东游击军在战役中起了重大的配合作用。“宣、达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川陕革命根据地与游击区连成一片。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从此,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伟大的长征。后挥戈北上抗日,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四川苏维埃运动进入了以川陕苏区为中心的全盛时期,也标志着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时期的结束。

四、结 束 语

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发展于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大环境之中。但是,地方性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四川苏维埃运动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就是,第一,四川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农运基础薄弱,党中央的指示从传达到贯彻迟于其他各省。因此,四川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从时间到实践均落后于受过大革命影响的湘、鄂、赣、粤等省。从1927年7月20日中央发布第九号通告起,至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全国苏维埃运动经历了从早期到中期的发展阶段,其间有海陆丰、湘鄂西、湘赣、闽西、湘鄂赣、鄂豫皖、赣东北、琼崖、左右江等九块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深入的土地革命,各根据地都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和规定制定了具体的政策,颁布了若干土地分配条例,进行了土地革命。土地革命中期,大多数革命根据地虽然执行过“左”的政策,但在总的方面,各根据地经历了从没收一切土地到只没收地主土地的转变和土地分配政策的逐步完善。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至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苏维埃运动进入后期阶段,又有赣南、湘鄂川黔、川陕、陕甘等十个根据地进行了土地革命。当全国苏维埃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四川苏维埃运动仍处于举行暴动、武装起义的初级阶段。在建立的苏区根据地中进行的土地革命,仅限于没收地主财产,田地分给农民。土地分配方法是由苏维埃政府指定田地,插上竹签,填上分得土地人姓名分给农民。基本上是红军“给予”和革命委员会“支配”,没有深入发动群众直接参加平分土地的斗争。没收一切土地进行分配,是贯穿于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始终的土地分配原则。第二,由于组织农民暴动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而四川农村广大农民未受过革命高潮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四川地区红色政权的诞生有一个较长的时间的孕育过程,举行暴动会遇到艰难曲折,而不同于其他根据地是依靠外来革命武装力量的推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四川早期苏维埃运动的功绩和历史影响是伟大而深远的,同时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诸如:四川省委在执行中央正确指示的同时,由于受其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因而在理论指导上有某些失误;省委过于强调军事行动,对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充分利用我党在四川军阀部队中统战工作的基础及军阀混战的局面,建立起巩固的红色区域等。这些历史的教训,在今天无疑仍然是值得认真反思和研究的。

注释:

[1][2][3][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35—338页,第288、312页。

[5]《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关于政治任务与策略、左派国民党与苏维埃口号问题》,1927年10月15日,

载《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编》。

[6]《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2日。

[7]《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4页。

[8]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138页。

[9]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同上,第115页。

[10]《中央通告第二十三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65页。

[11][12][13][19]《四川暴动行动大纲》,1928年3月。

[14][15]《中共川南特委扩大会议关于南溪暴动问题决议案》,1928年。

[16]陈乔年、任旭、黄五一《对于湖北问题的总答辩》,1928年1月10日。

[17]《湖北省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1927年12月12日。

[18]《四川暴动计划》,1927年11月27日。

[20]《中央致福建省临委信》,1927年12月30日。

[21]《中央告江西省委同志书》,1928年1月1日。

[22]《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8年1月12日。

[23][24]《中央给四川省临委信》,1928年3月29日。

[25]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26]瞿秋白《多余的话》,1935年5月20日。

[27][28]《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会议决议案》,1928年7月9日。

[2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

[30]《中共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第七号》,1929年3月26日。

[3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第383页。

[32]《中央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1930年1月20日。

[33]《中央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决议案》,1930年9月。

[34]《特生向中央的报告》,1931年6月。

· 书讯 ·

骆天银《管理哲学论》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管理系副教授骆天银的新著《管理哲学论》已于今年6月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324千字,共有9章:导论、管理本质论、管理要素论、管理系统论、管理信息论、管理控制论、管理决策论、管理价值论、管理艺术论。这是作者博采众长,精心设计,大胆构建的一个新体系。它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揭示了管理哲学的对象、性质、作用和基本内容,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管理哲学是关于管理普遍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是现代管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科学的管理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管理精神的精华。本书既阐明高深的哲理,注意训练管理方面的理论思维能力,又讲清实际的做法,尽量使一般管理学原理易于掌握,便于操作,读之有意深、通俗、实在、可行之感。本书信息量大,学术性强,视角新颖,资料翔实,语言流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实用性和较强的可读性。(骁驹)